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蹟。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五周年，經過三年新冠疫情，加上國際環境經歷深刻變化，持續深化改革的道路何去何從？敝刊正在策劃一個評論專輯，歡迎海內外學者惠賜鴻文，共同推進多元而深入的討論。

——編者

## 卡特政府與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

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訪美，2月17日中國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兩個事件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繫？當時的美國卡特（James E. Carter）政府對鄧小平的出兵計劃持何種態度？過去有學者認為美國默許甚至支持鄧的出兵計劃，而傅高義（Ezra F. Vogel）、張曉明等雖然提到卡特政府試圖勸阻中國出兵越南，但所使用的檔案材料相對單一，且對其決策和應對過程的描述相對簡略。

李桂峰、薛鵬程的〈卡特政府對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認知與因應〉（《二十一世紀》2023年2月號）一文則試圖更為細緻地釐清這一問題。

通過使用2013年公開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兩位作者有力證明了卡特政府並不希望鄧小平出兵。文章提出，在鄧訪美之前，美國情報機構已經預判中國很可能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卡特政府認為，中國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不久後即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可能會使美國國會和民眾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正面影響產生懷疑，同時授美國國內親台派以口實，藉此渲染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威脅；而越南如果受到攻擊，蘇聯也可能捲入其中，因此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出於這種考慮，卡特政府在鄧訪美前和訪美中多次勸阻中國不要以武力「懲罰」越南。卡特與鄧進行了三次會談，反覆表達了不希望中國出兵的立場，但未能改變中國的態度。

在意識到中越武裝衝突難以避免後，美國最終採取了「要求從印度支那撤出所有的外國軍隊」的立場，將中國的軍事行動與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聯繫在一起，一方面能夠為美國贏得一些國際支持，另一方面不會讓中國陷入被孤立的境地，同時還可以對蘇聯形成一定牽制。應該說，美國的

這一立場維護了自身的利益，事後也被證明符合中國方面的預期。

文章還詳述了戰事發生後卡特政府所採取的相關措施。對蘇方面，卡特政府反覆傳遞希望對方保持克制、不要捲入的信息。對聯合國，美國建議安全理事會要求各方立即停火。對華方面，美國在繼續推進兩國關係的同時，重申不贊成中國出兵的立場，並希望獲得更多關於中國目的的信息。

本文脈絡清晰，論點頗具說服力，對卡特政府決策中的各方面考量均有提及。但如能結合更為豐富的史料和更廣闊的歷史事件作進一步分析，發掘相關決策背後的一系列國內、國際結構性因素，如白宮與國會之間的張力、美蘇權力競爭等，或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卡特政府的立場與政策。

管浩 北京

2023.3.8

## 對社會主義國家間複雜關係的呈現

隨着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研究冷戰史的學者開始有機會接觸到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檔案史料。於是，對「鐵幕另一邊」的歷史研究成為冷戰史新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研究者往往發現，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家間關係，尤其是蘇東集團的內部關係，並不是像以往人們所認為的那樣鐵板一塊，而是展現出更多的複雜性。

童欣的〈蘇東「對華國際」瓦解始末——以中國與東德關係為中心〉（《二十一世紀》2023年2月號）就是對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會主義國家之間複雜關係的一次呈現。原先由蘇聯主導、在1960年代中後期聯合其他主要華沙公約成員國建立起來的鬆散的反華組織「對華國際」（Interkit）如何逐步瓦解？作者以東德與中國的關係為切入點，嘗試將中國改革開放、中國與東德關係正常化和對華國際的最終瓦解結合起來進行觀察。

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紹了對華國際成立的緣起及其後續的發展與作用，並強調東德一直是對華國際的積極參與者，是蘇聯反華政策的「急先鋒」。第二部分論述了文革結束後中國在外交政策上淡化了意識形態色彩，變得更加務實和謙遜，於是對東歐國家的「區別對待」政策開始發揮作用。而東德因其國家利益的訴求轉變了對華態度。對於作者仍然使用「區別對待」這個概念，筆者持不同意見。雖然作者認為從19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國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都被稱為「區別對待」，但也指出「不強求東歐國家加入反蘇統一戰線」是此時中國對東歐外交政策的特點。中國在60年代的「區別對待」政策，其本質就是一種反蘇的統戰政策，所以一旦中國放棄了反蘇統戰，所謂「區別對待」的內涵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此，仍然沿用「區別對待」這個概念是否合適？

第三部分論述了在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發表「塔什干講話」後對華國際的瓦解過程，並且突出在1982年的對華國際會議上東德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此時蘇聯與東德關係中是否可能存在一些與兩國對華政策無關但卻產生作用的因素，從而使得東德在對華政策上決定與蘇聯對着幹。比如1981年底東德被告知，原先蘇聯計劃在未來五年每年提供給東德的石油從1,900萬噸減少到1,300萬噸。

總而言之，文章充分揭示了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的複雜面向，為相關問題的後續研究作出有價值的開拓。

葛君 上海  
2023.3.14

### 不具「分而治之」形式的「治之」

政治學領域中對於「行政區劃」的定義並不存在唯一版本，原因在於不同「國家」有着不同的形成過程和構成方式。因此，有的定義單純界定國家基於行政需要在其領土範圍內劃分次級「行政區域」（administrative division）；另一些定義則側重國家面對內部擁有不同文化傳統乃至政治傳統的區域，以差異化的政治措施劃分不同的「次國家實體」（subnational entity）。無論如何，中國內部的行政區劃絕不只是一個「行政」的環節，它與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關聯。具體到與內蒙古這個區域相關的行政區劃事務，就不僅涉及到次國家實體，還涉及到國家政治（national politics）

乃至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

王朝中國在其「邊緣—非農耕—非華夏」區域所做的行政區劃，目標都是製造「分而治之」的政治效應，但在曾經主張民族自決，後又堅持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中共那裏，不能在外觀上追求這個政治目標，而且有必要反其道而行，內蒙古統一行政區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形成的。段世雄的〈內蒙古統一行政區域的形成與演變，1945-1979〉（《二十一世紀》2022年12月號、2023年2月號）透過對一手史料的詳盡爬梳，復現了從日本退出中國東北到中蘇對峙局勢趨緩期間，中共在內蒙古行政區劃議題上的決策過程，在時代的大布景下為有志者和有識者提供了空前而有價值的歷史學研究成果。作為好奇和關注中國非漢族群區域行政區劃議題的學人，筆者也是在通篇拜讀之後，才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解了惑。

段世雄的研究顯示，面對內蒙古區域在清朝後期以來漢人移民和蒙古牧民交錯混居的現況，中共一改清末、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乃至偽滿洲國的慣性思維，透過擴大內蒙古自治政府、內蒙古自治區的管轄範圍，達成對內限制內蒙古的「自治」程度，對外取得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信任的整體政治效果，其中的細膩操作，遠勝過當年蘇聯將克里米亞劃屬其「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的貿然之舉。觀察這種不具「分而治之」形式的「治之」，應該是世人了解包括民族議題在內的當代中國政治史的重要切入點。

吳啟訥 台北  
2023.3.21